

2002/4  
1993年创刊

冬之卷

3-5-10



中國  
文化  
研究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 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

## ——明代贵州方志成就探析

张新民

**提 要** 由于权力中心的支配和行政理性了解地方性知识的需要,明代贵州各地志书修纂活动明显表现出普遍化或经常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已以反思的形式受到了学者的广泛质疑,边地知识作为国史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本土学者渴望进入中心的边缘性焦虑和大一统冲动,更直接构成了地方人士积极参与修志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因。明代贵州志书的叙事倾向中已清楚反映出文化觉醒的意识,其体例也逐渐趋于完善并大体定型,不仅代表了有明一代地方学术文化成就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也为清代修志活动的空前兴盛准备了思想资源和典籍依据条件。

**关键词** 地方志书 边地知识 大一统 文化认同

明代贵州地方志书的广泛修纂不仅扩大了宋元以来地方知识系统积累的范围空间,同时也彻底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本土历史文化长期锁闭在中原学者视野之外的状况。从地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看,明代贵州方志的不断修纂还代表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史传统,既是恢复地方历史记忆、建构知识学文本世界的尝试性活动,也是唤醒本土意识并转化为话语表述的象征性标志——地方志本身即是地方文化的自我记忆与自我意识,是人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见证和具体记录。它一方面配合了中心地区以学术为主线的文化传播演化进程,为大传统主流思潮所统摄;一方面也植根于边缘地区多元性的文化格局中,明显受到小传统原生性知识的制约。易言之,即志书知识学系谱是在大、小传统相互涵化的张力结构中不断累积和发展起来的,不但受到大传统学术文化依据内在理路向外发挥濡化力量的规定性影响,而且也与小传统边地文化渴望进入中心叙事倾向的潜在心理有关。人类文明成就的传承既然离不开代代学者与抗拒遗忘有关的话语活动方面的努力,也就需要包括方志文本在内的各种文化典籍从不同角度如实对其加以客观记载。本文拟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检讨明代贵州方志的修纂活动,以求呈现内涵于其中为诠释学所容许的多元意义。自知疏漏不妥之处难以避免,敬请海内外同好有以教之。

### 一、权力话语支配对修志活动的影响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任何一方面说,都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一载:“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丁亥,置贵州都指挥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顾)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

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兵者属兵部”<sup>①</sup>。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又设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sup>②</sup>。贵州自此三司并立,共掌一省行政,结束了长期分隶于云南、四川、湖广三行省的分散状况,成为直隶于中央王权的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即全国性行政结构系统中的(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下领贵阳、安顺、都匀、平越、黎平、思南、镇远、铜仁、石阡十府<sup>③</sup>。

贵州行省的建立,是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南边地最重要的一项战略举措,是与全国整体形势密切相关且积累已久的历史力量直接推动的必然,当然也可说是贵州社会曲折发展、缓慢开放的归结。从此以后,除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积势已久的文化往返交流关系外,贵州边地又多了一重明显而直接的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互动关系,至少就贵州与中央王权权力系统关系的加强而言,政治意义上的行政边缘由于直接受控于权力中心,二者之间的关系已开始以一种新的历史关系中获得重建。这自然极有利于地方经济、教育、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或交往。以修志活动为例,明确的行政组织架构及行政命令,就使省及其他次级行政机构的志书修纂事业更加合法化和经常化,特别是王权中央出于行政理性的需要,急于纂修全国大一统志,并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遍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sup>④</sup>。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由于权力中心的要求和支持,无论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迫于行政命令,慑于权力话语,自然都得依例行事,同时省级布政司自身在行政的合理性要求下,也必须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sup>⑤</sup>,以备纂修省志,并上呈礼部参考。这里已足以显示,由于中央权力中心的话语支配,修志已不再是个人或私下的行为,甚至直接与权力中心相通而不再是“边缘化”的学术活动,加上行政上已是独立的行省设置,中央王权对贵州地方的了解,无论知识来源或取径方式,都显得更直接、更畅达。故终明一代,修志之风浸盛,数量更成倍增加,代表了地方学术文化成就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譬如《思州府旧志》,即是贵州置思南府建省后,首任知府崔彦俊于永乐十五年(1417)“奉命采辑录成,差老人谭祖庆进呈”的<sup>⑥</sup>。呈辞云:

臣奉布政司敕,付蒙行在礼部贡字二百号勘合,差主事林得等到司转住所属,委文理官员及教官儒士,采取古今事迹,并新旧书回京。臣彦俊查得旧无志书,与教官何辑照依凡例,采纂造册完备,具奏<sup>⑦</sup>。

① 《明史》卷三一六,《土司传》。

② 见《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一〇五。杨联陞解释三司长官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他们之所以都带有“使”字头衔,乃是代表他是“中央政府的一位代理人,是奉派来治理地方事务的”。参阅杨氏著《国史探微》第1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③ 贵州布政司初领八府、一州、一县,另有一宣慰司及三十九长官司,以后始调整为十府、九州、十四县及一宣慰司、七十六长官司。除遵义地区外,范围已大体相当于今贵州辖境。

④ 沈勳:永乐《普安府志》序,原书已佚,“序”载嘉靖《普安州志》卷首。

⑤ 蔡懋昭:万历《思州府志》序,原书已佚,“序”载曹申吉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二,《艺文志》。

⑥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十四,《艺文志》。今按:贵州学术文化方面的成就,一般以为诗(歌)、禅(学)、志(乘)三者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即使较之其他文化省区,也自有其特色。

⑦ 郭子章:《黔记》卷四十,《崔彦俊传》。

由此可见,国家与地方的行政互动关系,建省以后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由于行政理性的需要和权力架构的支配,修志活动不仅自上而下,督促甚紧,甚至本身就是一项行政内容,要求甚严。而各地编造志书,体例也一概依准朝廷颁降修志条例。如永乐十六年,沈勛修《普安州志》,即因“累檄切督,固辞弗可,于是旁搜幽讨,溯流寻源,或稽证于他编,或索遗于重译”<sup>①</sup>,始纂定成书的,其体例亦“悉依颁降条例书之”<sup>②</sup>。除永乐年间所修几部志书外,以后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历朝都续有纂作,至万历而达于高潮。天启、崇祯两朝,值明末社会动荡,边事扰乱,战祸波及中原川蜀,但贵州由于山川盘纡隘阻,外来冲击难以形成巨大历史变故,仍相对稳定,较少纷扰,故一时成为士大夫避居之地,而修志活动也依然续作不辍。初步统计,终明一代,仅省志设局官修者,即有四部,其余各地纂修的府州县志,达六十余部。贵州布政司所领之府县,可说大部分都纂修了志乘,其中铜仁、石阡、思州三府先后两纂,镇远、思南两府先后三纂,黎平府、普安州、普定卫竟前后四次修造。具见十五世纪建省以后的贵州,地方志的修纂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已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普及并步入经常化和规范化的正轨了。

## 二、文化意识的觉醒与边地知识系统的建构

贵州倚滇扼楚,负蜀襟粤,疆域四错,形势险固,是中原进入云南必经之战略要地。明中央王朝之所以要在这里建立与其他富庶地区并列的独立行省,主要仍是看重其作为军事要冲的空间战略意义,目的在于有效控制云南,从而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理性化行政制度对西南边地的绝对支配,稳定大一统政治行政秩序和地方疆域秩序。朱元璋的“(贵州地区土司)鸾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的表述<sup>③</sup>,可说用最功利、最坦率的语言,说明了他对贵州军事战略空间的重视。而清代田雯、徐嘉炎“无黔则粤、蜀之臂无可把,而滇、楚之吭(无)可扼”,故“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者”一类的议论<sup>④</sup>,其实都不如朱元璋之言来得痛快和直接。至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有关贵州地理形势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迳来作为朱元璋看法的佐证或注脚<sup>⑤</sup>。但军事空间的重要性一旦以行省的区域形式加以固定以后,为了维护这一军事空间自身内部的稳定和

① 沈勛:永乐《普安州志》序,见嘉靖《普安州志》卷首。

② 沈勛:永乐《普安州志》序,见嘉靖《普安州志》卷首。

③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一。按“鸾翠辈”的说法,既是地方土司的具体确指,又颇有后来建省的区域概括意义,同时也是区域地理位置的某种隐喻。

④ 田雯《黔书》卷上,《创建》;同书卷首,徐嘉炎序。

⑤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二〇,《贵州方輿纪要序》说:“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取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指辰、沅,声言下湖南,则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鸱蔑萌也。问途濡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嚙吭且为我所盖益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可说是将贵州军事战略空间的意义,阐发得淋漓尽致,足证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已是明清两代朝野之士的普遍共识。顾氏所言已道破了贵州之所以置省的一部分理由,更可视作朱元璋地理战略思想的再诠释和再补充。

巩固,官僚理性行政系统也会主动将大传统政教合一(或统一)的思想学说贯注其中,使军事战略空间转化为符合大一统价值诉求的意识形态空间,易言之,即达致军事控制和政治控制二者的空间性重叠、统一、互补和融合。这一点就明代而言,实际亦始于朱元璋招收贵州边地土司子弟“入国学受业”,或就地“设儒学”,“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即“变其俗同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策略<sup>①</sup>。只是建省以后类似的措施大体都沿着形式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较之明代初期效果更为明显,影响也更加深入而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明令土酋子弟必须入学接受儒学教化,并经地方学官考核认可后,才有承袭土司的资格。这固然有利于儒学正面价值的播散,也符合儒家礼乐教化、陶冶民俗的本愿或初衷,但从权力支配和话语霸权的角度看,则不能不说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控制,是以意识形态控制边地社会生活空间以维护一统的策略性做法。

然而,随着明代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驿道的进一步开通,汉族的大量移入,本土人民也在积极从事文化建构和意义创造的工作,他们多数都从自己的理解视野和解读立场出发,把政治实体的行省当成文化的场域加以主动认同,使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转换为人文化或人性化的空间,并融入人伦日用的寻常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引发出深厚的热爱乡邦文化的情感和相应的话语系统。而学校的普遍兴起<sup>②</sup>,中原文化的长驱直入,地方人才的联袂而起,一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的贬谪贵州,也培养了一批声闻特达、具有儒者气象的士子,为化解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深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应有的交流与互融,储备了一批持守儒家大传统文化理念的地方性人才,于是昔人不甚经意的蛮荒边徼,自然也进入了许多有识者的视域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杨慎(升庵)嘉靖《贵州通志》序说得最明白:

贵州为邦,在古为荒服,入明代始建官立学,驱鳞介而衣裳之,伐芴蕪而郡县之,铲寨落而卫守之。百七十年来,骎骎乎济华风;而嘉靖中又特开科增额,人士争自磨砺,以笃祐文化,翼赞皇猷,与为多焉。……今之议论,以边徼为遯远,不之重;而官斯士者,亦自厌薄之。呜呼!边可轻乎哉?衣之裔曰边,器之美曰边;而器破必自美始,衣破必自裔始,边徼之说,何以异此?边可轻乎哉!

杨慎长期生活在西南地区,极为明习边事<sup>③</sup>。与倾向于用国家武力解决民族矛盾和大一统问题的做法不同,他的话语更代表了一批肩荷文化传播责任的儒生士大夫的价值立场,即更重视文化的取向——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来凝聚边地民众向心力的取向,也可说是另一种与耗损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达到大一统目标的霸道力量相对立的温和派文化势力。后世修志者屡次转辗引述杨氏这段话,用来作为必须重视志乘修撰的话语依据,则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建省以后的贵州,已逐渐被人们看成是符合大传统价值理念的华夏文明区域之一。易言之,即虽然就贵州行政区域内部各地而言,仍存在着生活习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差异,但如果衡之以“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之礼则诸

① 分别参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五〇,卷二四一。

② 关于明代学校教育与科第的兴盛问题,可参阅周春元先生等《贵州古代史》第262-26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杨慎嘉靖五年以“议大礼”谪贬云南永昌卫,前后凡二十二年,在滇谪居期间,杨慎常往来黔地,讲学授业,动经岁月,从游者甚众,滇黔士子多以师礼事之,可说是转移地方文化风气的一代大儒。

夏之”的夷夏观,则不能不得出贵州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文化高于民族,文化也高于政治和国家,“駸駸乎济美华风”的贵州,早已统一到中华文明的大范畴之内,即使位处边缘,长期遭受轻视,偏见层累沉淀而积重难返,但也是总体而全程的中华文化系统结构中的子系统之一,地方志书及其他撰作如不及时加以记载,便是民族集体“共业”生命的重大缺憾,是华夏文化整体全程结构中的巨大遗漏。这里的大一统意识既是“天子守在四夷”传统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透显出以文化价值为根本的历史性新动向。更重要的是,杨氏所言还反映了重中心、轻边缘的文化心理和理论主张以反思的形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因为“大一统”本身也是一种整体的观点,即使边缘也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既不能与中心分割,也不可率意轻视,中心与边缘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可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结构张力关系,尤其出于维护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理念正当性的需要,更有必要巩固西南疆域,研究边疆史地之学,积累边疆史地的知识学系统。可见杨氏的这段话也代表了沟通文化中心与边缘并消解其二元紧张的一种努力,预示着边疆史地之学将会越来越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而地方志作为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文本依据,也以历史见证的方式积极发挥了建构边疆史地文化知识体系的作用。

### 三、本土关怀与大一统冲动

正是在华夏礼制文教思想及文化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大批贬谪和宦游黔省的文人学者,他们或由于行政理性的权力化要求,或出于知识理性的探寻热情,或主动自觉地积累地方性的知识,或有感于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题咏风物,组织佳篇,发为宏文,撰成专著,既编修了不少成功的地方志书,也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如明天台王士性,游踪颇阔,凡“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寇国策,俚语方言之贻”<sup>①</sup>,多笔札为文,汇辑成帙;其《广志绎》一书,即几乎可与《徐霞客游记》媲美,二者都是享誉学林的重要地理游记著作。作者“搜考遗佚、风会、物产,一一详核”<sup>②</sup>,其中卷五《西南诸省》部分,即据身所见闻,实地考察而成。后人摘出有关贵州一篇,录为《黔志》一卷<sup>③</sup>,足资谈地方掌故者考证,也是成书较早的边地志乘。贵州巡抚郭子章,更于平播戎马倥偬之际,辑成《黔记》六十卷,“雅有法度,为世所称”<sup>④</sup>。除地方志书之外,这一时期有关贵州的其他著述,数量也在急遽增加,仅以史部为例,便有朱燮元《黔中疏草》、宋尚德《贵州宋氏世谱》、宋濂《杨氏家传》、周洪谟《安氏家传》、罗仪廷《罗氏族谱》、邢慈静《黔涂略》、江之春《安龙纪事》、王轼《平蛮录》、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高拱《靖夷纪事》、郭子章《黔中止榷记》、李化龙《平播全书》、李木云《全黔纪略》、李珍《水西纪略》等。上述著述的作者尽管在解决贵州边地问题上,或有着倾向武力与倾向文化策略性意见的不同,但仍足以显示相当一部分学者已将关注点从中心移向了边陲,他们都强烈意识到边地知识也是国史之所应俱存,不能不随时搜考、整理、汇辑和编撰成书,以免遗漏之讥或不全不备之消,于是,有关贵州的文本化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与系统,获取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和多样。

① 王士性:《广志绎》自序,嘉庆《台州丛书》本。

② 《广志绎》卷首,曹溶序。

③ 《黔志》有《学海类编》本、《黔南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 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艺文略》。

特别就肩荷有稳定一方政治文化秩序责任的官员而言,如果资治佐政而缺乏地方性知识,在一般读书士子看来,则不仅是人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的一大遗憾,同时他的行政举措的合法性、可靠性(即理性基础)也应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即十五世纪贵州建省以来,明代参与修志的本土学者,人数也在明显增多。许一德与陈尚象的修志活动,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贵阳许一德乃隆庆五年(1571)进士,立朝多所建白,晚年乞休归里凡十余年,“敦厚谦谨,人称长者”<sup>①</sup>。贵州大儒陈尚象自谓:“夫黔,余生长之地,桑梓之区”<sup>②</sup>,曾以中书舍人为刑科给事中,因力言建储事,廷杖削籍归里。他们二人都曾应聘入志局,为万历《贵州通志》的实际主笔。万历《贵州通志》条纪属比,损益折衷,极得史家一贯之笔法,叙事谨严而绝不出以臆说,无疑是和他们固守儒者身份所特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长期受大传统文化涵化而表现出来的才、学、识分不开的。此外,也有本地人潜心究学,发奋搜讨方邦文献,辛苦历年,独力任之,而终有所成者。如黄运昌、谭瑞均分别撰有《黔记》<sup>③</sup>,娄广、周瑛、汪大有、何东风等人,也撰成《普安州志》、《兴隆卫志》、《普定卫志》、《黎平舆地志》,惜概未流传,具体内容已难以考究。

参加修志的贵州本土学者,都在价值理念和礼乐习俗等方面,自觉地认同中国文化,认为自己乃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正统传人。他们不愿意看到像贵州这样已经有长久开发历史的地区,在有了省一级行政单位的独立建置后,仍处于被冷落、疏忽、鄙视或贬责的边缘状态。因此,他们在大传统和小传统文化张力结构形成的特殊背景和压力下,反而能超越狭隘地域或局部社群观念的局限,把自身区域的前途命运和整个华夏文明的兴衰荣瘁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文化建构和志书修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出发点。换句话说,即“大一统”不仅是中原官方意识形态的自觉渴望,同时也是边地学者发自内心的热情冲动。尤其后者,由于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缘性焦虑,这种冲动有时反而更强烈,转化为话语表达所流露出来的倾向也更明显,而“天下平则文物盛,统势一则图志明”<sup>④</sup>,无论就观念或实践的层次而言,“大一统”的冲动都不能不有相应的撰述要求,将地方性知识纳入大传统史学结构的方志系谱之中,正是彰明一统大势和华夏文物典章盛况的最好方法。方志不仅关涉“世运”,而且直接就是“经邦之道”的一种方式,因为“一统有志,即《周礼》大司徒掌图之意,各省有志,即小史掌图之意”<sup>⑤</sup>,方志文本正是“天下一统以示无外”的象征性表示<sup>⑥</sup>,所以“记载之功盛矣”<sup>⑦</sup>。当然,一统无外的另一原因,在贵州本土学者看来,也是由于贵州边地民众革心向化,文教大兴,“家弘户诵,声名文物,彬彬足观”<sup>⑧</sup>,即化夷狄为诸

① 曹中吉康熙《贵州通志》卷二十,《许一德传》。

② 江东之《瑞阳阿集》卷三,《黔中疏草》陈尚象序,清乾隆八年刻本。

③ 参阅张新民《明代私撰六种贵州省志考评》,载《文献》1995年4期

④ 嘉靖《思南府志》卷首,田秋自序。按田秋乃思南府水德江司(今贵州思南)人,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礼科右给事。

⑤ 万历《贵州通志》卷首,邹元标序。

⑥ 万历《贵州通志》卷首,江东之序。

⑦ 嘉靖《思南府志》卷首,田秋自序。

⑧ 肖重望:万历《重修思南府志》序,原书已佚,“序”载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按重望乃思南府水德江司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

夏的结果。因此,他们批评那种动辄就以“边徼”、“僻壤”轻视贵州文化的做法,并一扫班固以来“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的内夏外夷民族偏见<sup>①</sup>,认为“黔于古非异域”,早在秦汉即为华夏版图之一部分,而儒教大传统不断在边地扩散其移风易俗的力量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只要不过分怀有民族的歧视性偏见,便可发现贵州天、地、人三才都有足以称道之处,于是,他们颂扬地方山川形势:“山经水纬,天地献其奇,重峦覆嶂,造化佐其险,固荆楚之上游,而滇南之锁钥也,非所称徼外一大都会哉!”而边地人物亦多“驰神艺苑之场,蜚声述作之圃,言能载道,词可为经”<sup>②</sup>,所以大有必要质问那些对边地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怀有偏见的人,“遐陬僻壤岂无一丘一壑为造化所含奇者?”<sup>③</sup> 贵州本土修志者的这些话语,不能说只是个人偶然的一时即兴之言,它们同时也是边地一般读书士子普遍文化心理的折射或发抒。他们不仅渴望政治意义上的“一统”,而且也渴望文化方面的交流,希望这种交流能够更平等、更充分、更畅达和更协调,盼望思想和学术等方面都能接近或达到中原地区的水平,借用传统的说法,即“政统”、“道统”、“学统”三方面都无不出边缘状态而与中原地区合流。这里已不难看出,正是认同华夏文化的价值渴求和走出边缘状态的生命冲动,直接构成了他们积极参与修志编史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精神动因。

#### 四、文本特点及其发展定型

明代的贵州志乘,大部湮没难寻,从现存的四部省志和三部府州志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府、州、卫总领事实、人文,虽然以“图经”名目,明显属早期未成体志书,尚有“摘比分标,不相联合”<sup>④</sup>,简略粗疏,体例失当等缺点,然而统合一方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文献于一书,已大体具备省志规模。足见贵州建省之后,区域既定,疆理亦明,与省级区划相应的地方性人文史地知识,也开始依据行政编制得到了秩序化的归纳或整理。嘉靖《贵州通志》是第一部以“通志”题名的省志,分类以事为编,纲举目张,条贯整齐,举凡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土产、土田、户口、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职官、公署、宦绩、学校、科目、岁贡、祠祀、寺观、宫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名宦、人物、贞节、孝义、仙释、隐逸、迁谪、流寓、兵变、经略、艺文等,无不井然旷然在目,门类之繁多,远较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详赡,而体例之完备,亦更胜后者一筹。惟个别地方,如“以孝义、隐逸别于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人于人物”<sup>⑤</sup>,安排未周,甚为失当,反映贵州方志的编纂,在体例方法上仍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但就人物类传的增加而言,则可说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表彰乡贤及其他杰出之士的深层文化叙事倾向,也明白地透显出由地理意味颇重的图经类专书向更具有人文性质的史学撰述位移的文化消息,只是从完整全面的志书现象学应具有的“理想典型”(ideal type)的角度看,明代前期——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贵州,尽管地方志的编纂在数量上已经不少,但我们仍不敢断言其体例

①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4268页,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② 万历《贵州通志》卷首,《凡例》;参阅张新民《司马迁班固民族观及其史学实证精神异同论:从〈史记〉、〈汉书〉“西南夷传”谈起》,载《民族研究》1993年6期。

③ 万历《黔记》卷首,陈尚象序。

④ 《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文史通义校注》本,上册,第377页,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四,“史部地理类存目”。

内容都已完全臻于成熟。

然而延至十六世纪下半叶即万历年间,情况便大有改观,贵州方志的纂修不仅达到了高潮,而且已明显成熟并基本定型。也就是说,方志作为史部流别极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其模式或典型已大体确立和完成,尽管模式内部调整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仍十分广大,后世学者在体例和内容两方面都有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可作。其中万历《贵州通志》兼取弘治、嘉靖两志之长,或以府州卫所分类为编,或总述兼制经略以相联合,全书为图十有二,附目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形胜、曰民政、曰军政、曰学校、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经籍、曰艺文,“丰约同异,草创润色,裁正铨次,咸得其人,卓乎贵之宪章矣”<sup>①</sup>。郭子章《黔记》首为大事纪,以为全书之大纲节目,次有星野、舆图、山水、灾祥、群祀、征榷、艺文、职官、贡赋、兵戎、邮传、公署诸志,复列有总督抚按藩臬守令、文武科第、驰恩诸表,再继以帝王世纪,及宦贤、迁客、乡贤、忠臣、孝子、栖逸、淑媛、方外、宣慰、土司、土官、诸夷等传,凡可记之古今大事,无不悉加网罗搜考,是一部纪传表志诸体俱全,一如正史法度规模的方志。其中《大事纪》为贵州前志所无,而郭子章撰《黔志》时首创,述事略远详近,简洁而有史法,既远绍《春秋左传》及《史记》、《汉书》本纪编年记事一贯之传统,又为后世执笔操简牍者所效法,时人称之,以为“黔之故实,厘然指掌,虽黔人不稔也”<sup>②</sup>,后此贵州修志者发凡起例,大多相沿而不改,即必立大事记一目以为全书之纲,而人物传则申明大事纪之所未能详究。郭氏《黔记》同时又以类别区分的方法著标题而述史事,即使“名公巨卿,亦只载黔事,不及其他”<sup>③</sup>,矜慎而得史法,详悉而有次第,是贵州最有范型意义的志书。这些都足以显示,贵州地方志发展至明代中叶,已由较为粗糙的宋元图经过渡为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著述系统,而通过省志及其他志书的不断重修,也有效地将边地知识与整个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不仅使建省以后的贵州成为中国内部世界行政理性秩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区域环节,而且也使边地文化成为中国内部世界价值意义系统中最富个性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强化了贵州历史—地理的区域行政地位,又凸显了边地民众生活—价值的文化意义空间。

贵州建省并不断扩大郡县制度的范围,还意味着省内各府州县都必须增加一批数量可观的官员。这些具有科举功名的官员,出于行政理性的需要,或了解地方知识的愿望,也通过各种方式修纂了一批府厅州县志。也就是说,相当数量的一批外省籍官吏,他们在自觉建构政治秩序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建构文化秩序,他们在主动把大传统注入边地社会,以“教化”的方式治理民众之际,也没有忘记自己地方长官的官守责任,热心于设馆修志以保存地方史地文化和知识。这一时期的府厅州县志尽管精品不多,但成就仍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官修府厅州县志,现存的仅嘉靖《思南府志》、《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三部。万历《铜仁府志》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笔者尚未经眼。嘉靖《思南府志》八

① 万历《贵州通志》卷首,邹元标序。按以上所言,可参阅张新民《明代官修四种贵州省志考评》,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2期。

② 万历《黔记》卷首,丘禾实序。

③ 万历《黔记》卷三十,《江东之传》后附“蟪衣生(子章号)曰”。

卷,以地理、建置、田赋、祠祀、人物、拾遗、诰敕八志为纲,分统众目,“色色具备,井井有条”<sup>①</sup>,万历时知府赵恒重修当地方志,仍认为前此所修之志,“其事核,其体严,其文简”<sup>②</sup>。嘉靖《普安州志》十卷,分舆地、食货、学校、兵卫、祠祀、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十门,名目较《思南府志》略有不同,门类则稍多于后者。两志发凡起例,内容虽尚嫌简略,但从整体看,明物同记人兼载,史地与人文并重,诸体具备,条贯整齐。与其他同时期外省方志相较,仍未见任何逊色,可说已是早期定型方志。佚亡而可考者,如张守让万历《镇远府志》,“首舆地而次营建,列食货而继学校,载官师而人物、节孝、文艺、吏治、户口、选举、灾祥、风俗,以次胪列,若指诸掌,事核文实,例严裁当,称信史矣”<sup>③</sup>。“信史”二字背后隐涵的价值诉求,正表明人们已自觉地以史家笔法来从事修志,并展开方志批评工作。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分舆地、建置、官师、征输、秩祀、文献、边圉八志,又述厥故事,附以论著,凡九卷三十三篇<sup>④</sup>。与嘉靖两志相较,门目略有增损,内容似更完备,反映明代中叶,贵州府州县志也基本定型,各地修志活动的文化动力机制已大体形成,相当一部分学者修志的目的不但是为了物色山川,增加图籍,而且更是为了巩固祖国疆域,维护一统大业。修志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边缘地区主动认同中心主流文化的象征。因此,延至十七世纪中叶的崇祯年间,贵州的修志活动仍持续不断,如《都匀府志略》、《独山州志》、《黎平志》、《平坝卫志》、《清平县志》等,都纂成于明社将屋之际。这些修纂于不同时期的方志,既是本土文化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代表了明代贵州学术文化成就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同时也为清代修志的进一步发展及空前兴盛,准备了充分的学术资源条件与典籍前提条件。

(作者通讯地址:张新民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550001)

① 嘉靖《思南府志》卷末,张烈“后序”。

② 赵恒:万历《重修思南府志》序,原书已佚,“序”载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

③ 何天麟:万历《镇远府志》跋,载卫既齐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四,《艺文志》。

④ 此据袁表万历《黎平府志》序,参见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1993 by State University Ghent, Dept. East-Asia Sec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landijnberg 2-B-9000 Gent, Belgium,第457-459页;以下言崇祯时期所修各志,亦可参阅《贵州地方志考稿》之具体考证或著录。

# 漢學研究

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總第 43 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 學術資源與地方文化經驗的交融整合

## ——清代貴州方志纂修的文化現象學探析\*\*

張新民\*

### 摘要

清代貴州地方志的修纂，一方面沿著制度化的理性方向發展，一方面個人私撰的風氣也日漸盛行，不僅外來的客籍人士主持編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乘，而且本土學者也積極參與各地的修志活動，特別是少數民族志家學者以私家之力主纂省志，更是大、小傳統相互交融涵化的象徵性事件。而外來學者從多元一體文化的視域出發，也看到了邊地民族文化實存的意義和價值。在大、小傳統文化交融互動的催生力量下，清代中葉的貴州已湧現出一批可與中原名志媲美的優秀志乘。以後則由於經世學風的興起和西學東漸的影響，志書文本內容也明顯出現了現代性的發展趨向。

關鍵詞：貴州、清代、地方志、地方經驗、文化交融

### 一、前言

地方志的修纂既是中國史學傳統保存和建構歷史記憶的文本化體現，也是地方文化意識自我表達或主動交流的一種話語傳遞方式。清代貴州地方志的修纂，無論官修或私撰，數量或種類，內容或形式，其成就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不僅是方志學史或史學史內在理路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更

\* 作者係貴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中國文化書院院長。

\*\* 本文由許剛、張明二君幫助校對，又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是大傳統學術資源和地方文化經驗整合與交融的邏輯歸宿。本文擬從文化現象學的角度，嘗試分析清代貴州方志的整體成就。自知難免疏漏不妥之處，幸海內外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 二、貴州修志活動的制度化發展

清代是方志纂修的鼎盛時期。就貴州說，疆域基本確定，「改土歸流」大體完成，郡縣制度已在全省範圍內推行，<sup>1</sup>貴州已完全成爲全國政治秩序結構中較爲穩定的一部分。尤其清初盛世，行政威權的銳氣尚在，地方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文化發展，方志文本的纂修，自然也普遍起來。誠如賀錫藩所云：「風會既開，宜有紀焉！」<sup>2</sup>

清王朝入關穩定後，急欲瞭解各地情況，獲取地方知識，以便準確合理地決策施政，強化理性統治效率，故康熙十一年（1672）即詔令各省纂修通志，繪製地圖，目的在於切實把握各地山川形勢、戶口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並最終彙成《大清一統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中央政府又「命省郡各繪圖以進，且悉其境內之名山大川焉」。<sup>3</sup>於是「撫憲檄下所屬有司，采集編纂，將以彙成全志，上達御覽」。<sup>4</sup>及至西陲底定，搶攘初安，風移世變，文物復光，又再次「命臣工重修一統志，曾奉部牒咨查各

- 1 楊聯陞認爲：「郡縣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所有地方政府的長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隨著後代郡縣制度的發展，這種原則就變成了最高的原則。」改土歸流的過程，實際也就是進一步將貴州納入以皇權爲中心的權力秩序結構的過程，從世俗政治以集權爲特徵的權力支配的原則看，中央政府當然決不容許任何皇權體制結構之外的力量存在。參氏著，《國史探微》（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05。
- 2 瞿鴻錫等修，光緒《平越直隸州志》卷首，賀錫藩序，光緒三十三年刻本，第1冊，頁2上。
- 3 陸世楷，康熙《思陽志略》舊序，原書已佚，「序」載蔣深康熙《思州府志》卷首，康熙六十一年刻本，第1冊，頁5下。又《聖祖仁皇帝實錄》（偽滿洲國國務院影印《清歷朝實錄》第9帙本，東京：日本東京大藏出版社，1936），卷111，「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壬寅」條載：「諭大學士等……各省地圖，應行文該地方官，繪送兵部，以備披覽。至塞外地名，或爲漢語所有，或爲漢語所無，應察明，編入《一統志》。」陸世楷所言，即指此事。第5冊，頁19上-下。
- 4 何縉，康熙《黔西州志》序，原書已佚，「序」載乾隆《黔西州志》，卷8〈藝文〉，北京圖書館藏鈔本，第4冊，頁5下。

省部邑志書，采風型俗，教典明禮，備一代之掌故也」，<sup>5</sup>督修之急，更勝於前。而各地志書六十年一修，也成為制度化規定。因此，各省大臣在制度化行政理性的要求下，一方面必須配合《大清一統志》的纂修，把編輯通志看成是為政大事，一方面也「轉檄郡邑，新舊志悉供采錄」，<sup>6</sup>推動了各府州廳縣修志活動的開展。衛既齊（1645-1701）序康熙《貴州通志》，便明白地指出：

國有史，省有志，一也。人臣受一方之寄，民生物命繫焉，苟不知其溪山之險夷，土田之饒瘠，人物之繁耗，習尚之淳澆，與夫興革損益之由，治亂得失之故，即欲興道起化，整弊扶衰，亦何以措之！膚膜見而後針砭可投，灘湍熟而後舟楫可濟，雖有聖智，莫或易也。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因知天下厄塞；馬文淵聚米為山，隴蜀以平；朱晦庵所至，訪求文獻以輯志乘；前者後之師，古者今之鑒也。……貴州風俗猶近古，務質樸，悖誇詐，雖有碩德懿行，恒隱而不揚。加以數罹兵燹，文獻落落，耳目睹記，勢難廣遠，至有子若孫不能紀其祖父名字官爵者。其間所登，不過存十一於千百，尚有挂漏之嘆，況可見而不收，收而不詳乎？此余所以尤致謹也。余何敢比於前人，但因此覽風土，察形勢，思民苗之雜揉，睹生聚之艱難，一一皆於已試之效求之，庶知所以仰布皇仁，綏靖邊裔，以報稱簡任隆恩於萬一已爾！<sup>7</sup>

衛既齊的話已足以顯示：修志不僅是皇權中政府的政令要求，是主流意識形態鼓勵和認可的合法性行為，同時更是地方官員源自行政理性需求的內在價值自覺，是關係到職守任內決策施政好壞與否的一等大事。儘管從他們固有的意識形態立場或視野出發，方志敘事因有助於瞭解地方實際而具有政治功用的一面得到了較多的強調，而保存歷史記憶以傳達或體現一方區域文化價值的一面則稍有忽視，但具備一定的地方性知識，乃是「興道起化，整弊扶衰」，即達到一方社會長治久安的必要前提，仍是不可移易的道理。衛氏是封疆大吏（貴州巡撫），他的話適足以代表一般官員的看法。各級官吏出於行政理性的需要而主動編纂方志，自然極大地推動了志書事業的發展和大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播。故有清一代，貴州各地修志，已大體同於內地，不僅奉為故

5 胡章纂，乾隆《清江志》卷首，〈白序〉，貴州省圖書館藏鈔本，第1冊，頁7上-下。

6 萬齊壽增修，同治《石阡府志》卷首，〈自序〉，光緒二年刻本，第1冊，頁1上。

7 薛載德等纂，康熙（後）《貴州通志》卷首，衛既齊序，康熙三十六年刻本，第1冊，頁1上-3上。

事，沿為慣例，而且蔚成風氣，興盛難替。不少地方官吏，既承擔行政責任又懷有文化抱負，都把修志看成行政任內倫理職責，視為文化建構重要目的取向，力求以借詞比事之法，收學以致用之效。有的官吏縱然學識低劣，政績平庸，但由於受儒學價值理念的影響，在標榜自己政治身分的同時，也要附庸風雅，攀援清流，盜取虛名，虛張聲勢，招聘博學能文之士，啓館纂輯地方志書，以此炫耀自己的文化身分。於是官修私撰，種類眾多，數量豐厚，勝於往昔，超過前代。

由於權力力量的介入和推動，清代貴州方志的編纂，較之以往更得到了制度化的空前發展，僅清代前期之通志，前後即有三次設館修纂。如前所述，康熙十一年（1672），清王朝頒發賈漢復所纂《河南通志》為天下法式，詔各省督撫聘集儒賢，纂輯當地通志，備一統志采擇。各「直省通志無不畢修，用資簪筆之旁羅」。<sup>8</sup>貴州巡撫曹申吉（1635-1680）「奉檄開局，廣延耆彥，采輯舊聞，旁搜散佚，凡六閱月」，<sup>9</sup>得書33卷，為清代第一部貴州省志。曹氏主修此書，一方面是因為中央政府敕令纂修圖志，不能不有所撰述以應命，一方面也是有感於邊陲記載極為重要，不能聽憑其缺失而不加搜求整理。而延入志館主筆之吳中藩（1618-1696）、潘馴（1610-1681），都為黔中碩學宏儒，故志書纂成後，時人都以為周延詳備，手此一書，一方人物山川即洞若觀火，甚至還有助於培養邊地文化元氣。惟今日觀之，由於過度依準《河南通志》，劃一體例，強立篇目，仍難免多寡不一，簡略訛闕的弊病。加上吳三桂禍亂驟起，主修曹申吉一時不知所終，清廷遂將之打入《清史》〈逆臣傳〉，<sup>10</sup>其人既被認為行止有虧，其書亦不為世人所重，故長期鮮少流傳，評價更始終偏低。康熙三十年（1691），巡撫衛既齊復「開局延儒，廣稽博采」，<sup>11</sup>補以康熙十二年以後事及前志所遺者，成書36卷。惟書

8 同上註，卷首，丹達禮序，第1冊，頁1下。

9 潘馴等纂，康熙（前）《貴州通志》卷首，潘超先序，康熙12年刻本，第1冊，頁2上。

10 《清史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28），卷80〈逆臣傳·曹申吉傳〉，第80冊，頁14上-15上。關於曹申吉生平事迹及藩亂之後的去向問題，可參閱張新民，〈曹實庵與曹逸庵〉，《藝文論叢》（貴陽），1995：3，頁32-40。

11 同註7，范承勛序，第1冊，頁1上。

甫成，未及鋟板，衛既齊即以兵事逮京治罪。<sup>12</sup>閩興邦繼任巡撫，復逐卷增補，又別立《雜記》一門，為37卷，鏤板梓行於康熙三十六年。雍正七年（1729），清廷嚴諭各省修志，「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采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sup>13</sup>原則上是務必陸續纂成送繳。雲貴總督鄂爾泰奉詔開局，聘靖道謨同時纂修雲南、貴州二省通志，《雲南通志》先於乾隆元年（1736）成書，由尹繼善具表進之，《貴州通志》雖尚有杜詮輔助協司其事，惟一人兼修二部志書，成稿時間一拖再拖，延至乾隆六年（1741）始完全告竣，是各省所修通志中，成書最遲的一部。乾隆《貴州通志》凡46卷，以八綱分統57目，四庫館臣稱：「綜諸家著述，彙成一篇，雖未能淹貫古今，然在黔省輿記中，則詳於舊本矣」；<sup>14</sup>周中孚亦云：「取新舊諸志，郡邑志書，參以群籍，詳加稽考，頗為條理井然，雖文獻不足，無所取材，視《雲南志》為簡略，而以備十二府十一廳四十六州之掌故，其詳較舊志為遠矣。」<sup>15</sup>可見清儒一般評價較高，並沒有在滇志與黔志之間作過多孰優孰劣的抑揚。儘管黔志是否較滇志簡略，仍可有見仁見智的看法，原因是滇志之詳，實得益於舊志。但清儒之說，入民國以後，卻頗遭人訾議，個別學者甚至斥責四庫館臣所云，不過「想像之辭」而已，<sup>16</sup>「實則牴牾挂漏，較康《志》猶有遜色」。<sup>17</sup>時代不斷變易嬗替，評價亦有高低不同，現實之挑激影響清代及民國年間學者看法上的歧異，本屬學術批評史上的正

12 見《聖祖仁皇帝實錄》（《清歷朝實錄》第10帙本），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壬寅」條，第6冊，頁20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75，〈衛既齊傳〉，第33冊，頁10081-10082。

13 《世宗憲皇帝實錄》（《清歷朝實錄》第15帙本），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條，第10冊，頁24上。

1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68〈史部地理類〉，頁609中；又可參閱《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卷39，頁323中。

15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第5冊，〈補逸〉，卷12〈史部地理類〉，頁325。按黔志雖晚滇志六年成書，但卻同時鏤板，且有合集本；故周中孚遂以二書比較而以為滇詳黔略，但詳略的具體原因，仍需進一步考證和分析。

16 民國《貴州通志》（貴陽：貴陽文通書局，1948）卷首，譚克敏序，第1冊，頁5上。

17 同上註，袁世斌序，第1冊，頁7上。

常現象，並不奇怪。今細核全書，體例雖較舊志差強，敘事亦頗秩然，但迫於期限，草率從事，材料多錄前志，討論未為詳審，確有某些不足，且刪去明代即已創立之「大事記」一門，更大失史家以簡嚴筆法編年紀事之本意。蓋書成眾手，相互推諉，就其易而避其難，較之前此私撰之書——特別是郭子章《黔記》一類敘事謹嚴的志乘，識見仍遠遜之。

### 三、中國傳統志書修纂與少數民族學者的貢獻

明清易代以後，最值得注意的學術動向是，由於邊地文化的重要性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加上「大一統」文化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清代初年的學者都清醒自覺地意識到，邊疆民族地區的歷史也是「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貴州在內的各地區域史不準確或不完備，便是一國總體而全程歷史的不準確或不完備。華章志的看法最能說明這一點：

志者，史之餘也；黔者，吳越齊魯秦晉楚蜀之餘也。衣餘曰裔，匪裔不飭，器餘曰羨，匪羨不完，楊升庵先生言之矣。由是觀之，匪黔志則史不飭不完，而諸國之志不可云備，《黔志》可少乎哉？<sup>18</sup>

華章志重視邊地文化的看法，實乃直承明代大儒楊慎（字升庵；1488-1559）之言而來。楊氏早在嘉靖《貴州通志》序中就明白指出：「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明代始建官立學，驅鱗介而衣裳之，伐苻藪而郡縣之，鑿寨落而衛守之。百七十年來，駸駸乎濟美華風；而嘉靖中又特開科增額，人士爭自磨礪，以篤祐文化，翼贊皇猷，與為多焉。……今之議論，以邊徼為遯遠，不之重；而官斯士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邊可輕乎哉？衣之裔曰邊，器之羨曰邊；而器破必自羨始，衣破必自裔始，邊徼之說，何以異此？邊可輕乎哉！」<sup>19</sup>類似楊、華二氏的大一統話語，見於其他地方文獻者尚多，正說明明清兩代的學者，他們始終都在追求大一統理念的具體落實，重視邊疆史地問題研究的呼聲更一直承響不絕。在華章志看來，貴州不僅在地理或行政區劃意義上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更在文化或文明系統意義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完整的國史必須以完整的區域史（地方史）的積累與整合為前提，而完

18 同註9，卷首，華章志序，第1冊，頁1。

19 張道纂，嘉靖《貴州通志》卷首，楊慎序，嘉靖34年刻本，第1冊，頁1下-頁2上。